

儒法斗争史讲稿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宣传组编

儒法斗争史讲稿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宣传组编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一九七四年八月

說 明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領域里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資產阶级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內的整个上层建筑領域。为了帮助工农兵学员和教职工用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学习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的历史，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现将我院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在校内外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讲稿整理印发，供学习参考。

由于我們馬克思主义理論水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可能有錯誤和不妥之处，望同志們批評指正。

目 录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1
秦王朝建立前后及西汉前期的儒法斗争·····	17
东汉、三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33
唐、宋时期的儒法斗争·····	43
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58
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现实意义·····	78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叫做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前后共约五百多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儒法两家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儒法斗争的焦点是：建立和发展封建制，还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

一、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时代。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曾经历过奴隶制时代。那时候少数奴隶主统治着广大的奴隶群众，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在奴隶制时代，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制，从形式上看就是方块田制。在井田制下，土地被分成规整的方块，每块面积百亩（合今天四十多亩）。这样方块田被奴隶主国家控制着，私人不许买卖。奴隶主总头子——天子，把方块田连同奴隶分封给诸侯，然后诸侯、大夫、士层层分封下去。各级奴隶主把奴隶编制在井田上，强迫奴隶劳动，榨取奴隶的劳动果实，然后逐级上贡。各级奴隶主通过贡献的形式分配奴隶的劳动成果。可见井田制实质上就是奴隶主榨取奴隶剩余劳动的田制，是奴隶制的经济基础。

我国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礼治。所谓礼，就是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礼治下，各级奴隶主的婚、丧、嫁、娶、宴会等一切活动的礼节仪式都有尊卑贵贱的严格界限。如果有人违背了礼的规定行事，就被看成是大逆不道，被扣上“违礼僭越”的帽子。可见礼是用来维护奴隶主内部尊卑贵贱的关系的。奴隶主对奴隶则滥施刑罚，任意虐待残杀。那时候奴隶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所以他们根本用不着公布一个什么成文法典。在我国奴隶社会里有一条原则，叫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说礼是专门用来约束奴隶主内部的，刑罚是专门用来镇压奴隶的，这一套就是所谓礼治。

在奴隶社会里，广大奴隶被编制在井田上从事繁重的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奴隶主眼里，广大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打骂、买卖和屠杀。当时五个奴隶的身价才等于一匹马加一束丝。奴隶主不但活着的时候残酷压迫奴隶，死后还要用大批奴隶殉葬，妄图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奴隶社会就是广大奴隶群众的人间地狱。

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述那种奴隶制已经处于“无可

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了。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发展起来，这一社会变革表现在生产关系上，就是奴隶制的井田制的破坏，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表现在上层建筑上，就是法治代替礼治，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一）井田制的破坏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井田制的破坏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铁器和牛耕的出现上。在这以前我国还处于青铜时代。那时候人们是用木棒制成的耒耜掘土种地的。由于一个人用耒耜掘土太费劲，所以常常用两个人面对面地用耒耜共同掘一块土，这种耕作方法叫作“耦耕”。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赶着黄牛套上犁杖去种地了。这比用耒耜耕地的效率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旧的井田制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的基础上，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也就越来越高涨了。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的怠工、逃亡、暴动和起义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柳下跖领导的奴隶大起义，他领导着九千人的起义队伍，在中原各地纵横驰骋，吓得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头子都躲进城堡不敢出来较量。奴隶群众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由于奴隶的怠工、逃亡和起义使得井田上的生产维持不下去了，致使井田上莠子长得比庄稼高，地都撂荒了。于是有些奴隶主就利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招诱从外地逃亡来的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在井田之外开荒，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实行租佃制的剥削方式。在租佃制下，劳动者虽然仍受到主人的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交租之外还可得点东西，因此有了自己的经济，主人已经不可以随意屠杀他们了，就是说他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佃农了。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这种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不是上级奴隶主封给的，不属于井田的范围，私人有权处理，可以买卖。因此这种土地称为“私田”，原来的井田称为“公田”，这样就形成了公田、私田两种生产关系并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私田已经占了上风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表现在按亩收税制度的出现上。原来私田是不合法的，各诸侯国都是从井田上榨取奴隶劳动果实作为财政收入的。到了这时私田越来越多，而且庄稼长得越来越好，显示出新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公田却不断地受到破坏，生产越发维持不下去了，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便在私田上打主意。于是规定不论是私田还是公田，一律按亩收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就是开始按亩收税。其他各国也都先后采取了这个办法。这个税制的变化不但使私田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打破公私田之间的界限，这就进一步加速了井田制的破坏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二）法治代替礼治，地主阶级的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关于法治代替礼治，前面说过，礼是维护各级奴隶主尊卑贵贱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

范的。奴隶主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各级奴隶主就象层层垮了下来。与此同时，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日益扩展起来。他们必然要突破礼的束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违礼僭越”的现象不断发生，礼已经名存实亡了。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公布成文法典，实行法治，利用法律条文来限制奴隶主的特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形势下公元前536年郑国公布了“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了“刑鼎”，此后各国相继出现了成文法典。

地主阶级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必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必然要夺取奴隶主的政权。春秋战国之交，鲁国的“三分公室”，齐国的“田氏代齐”，晋国的“三家分晋”和秦国的公子连夺取政权等事件都是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地主阶级夺取政权，都是利用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力量，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才取得胜利的。例如齐国的田成子由于采用了封建生产关系，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老太太呀，挖野菜呀，快去投奔田成子呀！”（“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田成子在人民支持下力量日益强大，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才于公元前481年杀掉了齐简公，实际上掌握了齐国的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古今中外是没有例外的。

以上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大体情况。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个阶级都为自己阶级利益奔走呼号，于是在当时的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例如：法家、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等，都相继出现了。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百家争鸣局面正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但是不论多少“家”，就其主要观点来说，实际上是分成两大家的。一家是社会变革的促进派，一家是社会变革的促退派。法家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它主张推翻奴隶制，发展封建制，要前进，要革新。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它主张维护奴隶制，主张倒退，反对革新。其他各家不是倾向法家就是倾向儒家。所以百家争鸣归根到底还是儒法两家之争。

春秋末年主要的法家先驱人物是邓析和少正卯。战国初期和中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和商鞅。战国末期范雎和韩非是法家的杰出代表。儒家的主要代表则是春秋末年的孔丘，战国中期的孟轲。

二、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法家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早在春秋后期，法家先驱邓析、少正卯等就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大喊大叫，他们宣

传革新思想，为推行法治，建立地主阶级政权大造革命舆论。

邓析（公元前546——501年），郑国人。他以聚徒讲学的形式宣传革新思想。他宣传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山于渊平”，就是说自然界的高山与深渊之间的差别是可以改变的，人类社会的尊贵与卑贱之间的差别也是可以改变的。这种变革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提高地主阶级的地位提供了思想武器。邓析坚决反对礼治，主张法治。他反对以周礼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一套新兴地主阶级的是非标准，所以奴隶主贵族诬蔑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那时候郑国当权者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公布了成文法（即铸刑书）。邓析就利用法律条文为地主阶级辩护，向奴隶主阶级作斗争。他专为那些受压抑的地主打官司，据理力争，经常取得胜利，搞的奴隶主无可奈何。他自己还编了一部成文法，写在竹简上，被人们称为“竹刑”。这部竹刑完全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他宣传竹刑来和当权者的刑书相对抗（因刑书还是袒护奴隶主阶级的）。邓析的学说受到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的欢迎。历史记载向他学习诉讼的人“不可胜数”。（同上）邓析还利用类似大字报的形式，出政治揭贴，来揭露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欺压人民的种种罪恶，掀起一股革新风潮，致使“郑国大乱，民口喑”（《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喑”（同上）搅乱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奴隶主阶级对邓析怕的要死，恨的要命，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给邓析扣上“诈伪之民”（不老实、不规矩、好捣乱）的帽子，杀害了邓析。奴隶主阶级杀害邓析只能暴露他们凶残的本性和内心的空虚，丝毫也掩盖不了邓析革新思想的光辉。

少正卯（？——公元前498年）和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都是鲁国人（据考证少正卯原籍是郑国人，看来郑国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因为郑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主阶级兴起较早）。关于少正卯的思想，现有的史书上很少记载，但从孔老二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梗概。这五条罪状是：一、“心达而险”，是说他在思想上主张以地主阶级的利益来掌握政权。二、“行辟而坚”，是说他在行动上坚决主张用刑法，提倡法治，反对礼治。三、“言伪而辩”，是说他在言论上宣传注意人为，反对天命的思想。四、“论丑而传”，是说他在著作中有大量材料宣传矛盾对立，变化发展。五、“顺非而泽”，是说他支持造反的思想，并对它加工提高。（见赵纪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少正卯思想的这些特点恰恰是和孔老二对立的。大家知道孔老二正是反对地主阶级掌权，主张礼治反对法治，宣扬天命观，鼓吹中庸之道，调合矛盾，反对地主阶级造反的。少正卯也是以聚徒讲学的形式宣传革新思想。少正卯的学说是先进的，讲起来也很生动，受到人们的欢迎。连孔老二的徒弟都去听少正卯讲学，弄得孔老二门下“三盈三虚”，只剩下一个奴性十足的颜回没有去，师徒二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少正卯宣传革新思想，孔老二对他怀恨在心。当孔老二爬上鲁国司法长官兼代理宰相宝座的时候，便撕下了“仁者爱人”的面纱，杀了少正卯，并且暴尸三日，大搞反革命示威。少正卯遭到孔老二的杀害，正说明了他的革新主张是坚决的，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奴隶主贵族杀害邓析、孔丘杀少正卯，揭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这个斗争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是革命与反革命，革新与守旧，

前进与倒退的斗争。

春秋后期法家的先驱人物虽然遭到反动势力的杀害，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到了战国的初期和中期，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展开了，法家学派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不断发展起来。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地主阶级相继夺取了政权。为了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反动势力，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各国都先后实行了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最有名的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魏文侯以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为国相，实行变法。他的变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创造条件。按照奴隶制时代的旧制度，奴隶主贵族不论有无功劳都可以凭自己的贵族身份世代当官，世代享受俸禄，这就叫作“世卿世禄”制度。针对这个问题，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论篇》）的原则。就是说，为国家立功的人才可当官受俸禄，这就取消那些无功而受禄的旧贵族的特权。新兴地主阶级只要立了功就可以当官。李悝把那些只当官不办事的旧贵族称作“淫民”，他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地主）”（同上）。李悝的这项措施是代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争夺政治权力的措施。二、推行法治。他主张“赏必行，罚必当”（同上），就是说无论是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就把奴隶主贵族“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取消了。为了推行法治，李悝综合了各国成文法，并加以补充发展，编著一部法经。这部法经集当时成文法之大成，它是后来历代封建王朝制订法律条文的主要依据。三、发展小农经济，巩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他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措施，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生产。又创立“平糴法”，丰收年成，国家以较高的价格收购粮食，以防谷贱伤农，青黄不接之际国家以较低的价格出卖粮食，以防农民破产流亡。这就打击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投机倒把活动，稳定了小农经济。在封建制度下，个体农民是封建政权的赋税、徭役、役的兵主要来源。稳定个体农民的经济就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个措施发展了个体农民的经济，自然进一步排挤了“井田制”的残余。李悝变法的精神和原则是同儒家反动思想根本对立的。儒家就是要死抱着旧制度不放，拚命维护那过了时的世卿世禄制度、礼治、井田制。所以李悝的变法必然要受到儒家的破坏。孔老二的徒弟子夏就是破坏这场变法的急先锋。他在魏文侯面前讲述儒家的“经艺”，大灌迷魂汤，魏文侯拜他为师。所以李悝的变法虽收到显著效果，但未能坚持下去，魏国虽一度强盛，但不久就衰落了。

吴起（？——公元前381年），卫国人，公元前383年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各国的相）。吴起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旧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这是“贫国弱兵之道”。针对这种情况，吴起实行变法，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变法主要内容是：一、凡是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代以上的一律收回爵禄，与王室亲属关系疏远的贵族，一律降为平民。二、强令旧贵族“往实广虚之地”，变相地收回了他们原有土地。三、“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就是说推行法治，把冗官一律裁减掉。吴起变法使楚国很快强大起来，但变法不到三年的时间，楚悼王就死了。旧贵族乘机反攻倒算，准备射杀吴起。吴起急中生智，立即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吴起虽被乱箭射死，但却让

旧贵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楚国有个规矩：用兵器损害国王尸体的人都要处死。结果七十多个贵族都因射杀吴起而误中王尸被处死。吴起临危不惧，在生死悠关的时刻还设计打击反动势力，这种坚强的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卫国人，曾在魏国当公叔痤的家臣，李悝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公叔痤死，商鞅入秦。秦孝公任用他为左庶长，于公元前359年、350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一、废除井田制，破除井田上的阡陌封疆，允许人民开垦荒地，据为己有，可以买卖。这就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制定了依军功授爵禄的制度。商鞅规定凡无军功的贵族一律取消其世袭特权。另外公布了军功爵二十级，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爵位越高政治经济权力越大。通过这一改革打击了旧贵族的政治势力，鼓励了农民为封建国家立功，培养了一批新的地主，并保证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三、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把国内旧贵族的封邑一律取消，在全国建立三十一个县。县令由中央政权任免，这就剥夺了旧贵族在地方上的世袭特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小农经济。重农就是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目的是发展小农经济，巩固封建政权的基础。商鞅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又把农业叫做“本”。他非常讲究耕战政策。规定凡努力生产而增加收入的免其徭役；凡立军功的一律授爵，用这个措施来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当时工商业奴隶主的活动对个体农民威胁很大，商鞅抑商政策就是为了打击工商业奴隶主。把工商业称作“末”，采取许多措施加以限制。五、推行法治，公布秦律。商鞅把李悝的法经稍加修改，就在秦国公布实行，这就是秦律。他坚决反对儒家所拚命维护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治，强调“刑无等级”，不论什么人犯了法都一律制裁。这是加强地主阶级专政，打击奴隶主阶级势力的有力措施。

商鞅变法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早在变法实行之前，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龙、杜挚之流就大肆鼓吹“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用儒家的甘古倒退的历史观为反对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商鞅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复战斗口号，和儒家反动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历史是发展的，不能墨守陈规，从而提出了“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同上）的原则，有力地论证变法的必要。变法令公布之后，激起了奴隶主阶级更加疯狂的反抗，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唆使太子驪触犯法令。商鞅对奴隶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把公子虔鼻子割掉，把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抹上黑，狠狠地打击了太子驪的这两个后台。公子虔被割掉鼻子之后，八年闭门不出，等待时机反攻倒算。商鞅又在渭水河边处死七百多个反对变法的奴隶主和反动儒生。商鞅坚决反对儒家的“仁义”、“礼乐”之类的说教，把这些东西比作咬人吸血的虱子。为了除掉虱子，他采取了“燔诗书，明法令”的果断措施，在上层建筑领域来一个破旧立新。变法推行十年，收效很大，于是有些反对变法的奴隶主又使用儒家要两面派的那套惯用伎俩，伪装拥护变法，吹捧商鞅。商鞅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把他们称作“乱化之民”，流放到边地去。软的一招碰了钉子，旧贵族又来硬的一招，赵良赤膊上阵去威胁商鞅，他搬出儒家经典中的一句话，叫

作“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林贼也是用这句话攻击我们的），用来作为反对变法的理论根据。他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说商鞅用法太严，伤人太多，犯了众怒，劝商鞅知难而退，让出政权。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为反动派喊冤叫屈是古今反动派常用的手法。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不也是这么干的吗？赵良的一套谬论自然动摇不了商鞅坚持变法的决心。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驪继位，于是旧贵族纷纷出笼，大肆反攻倒算。公子虔的党徒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车裂而死，全家都被杀掉。血的历史告诉我们：象公子虔这类反动派闭门不出并非真的老实了，时机一到，就会向革命势力猛扑过来，露出凶残面目。

商鞅虽死，但商鞅在变法中所建立的制度却在秦国扎了根，谁也破坏不了。这充分说明了顺乎历史潮流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生产不断发展，国事蒸蒸日上，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国富兵强的先进国家。后来秦昭王用范雎扭转了旧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使地主阶级在政权机构中重新占了优势，巩固了变法成果。这就为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

战国前期和中期，法家的先进人物为了进一步夺取封建制的胜利，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排除奴隶主阶级和儒家反动思想的破坏和干扰，推动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到了商鞅便制订了一个完整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的社会改革的主张，并付诸实行。法家学派就是这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三、奴隶主阶级的垂死挣扎，儒家学派的反动叫嚣

一切反动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为了反对社会变革，挽救自己的灭亡，他们不但在政治上进行垂死挣扎，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制造反革命舆论。孔丘和孟轲就是奴隶主阶级在思想理论上的代言人。

孔丘（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后期鲁国鄆邑人。孟轲（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05年）是战国中期鲁国的邹人。孔丘是儒家的祖师爷，孟轲是孔家店的二老板。二人虽相隔一百多年，但他们的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这一百多年中社会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孟轲的时代，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了地主阶级政权，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这种新形势下，孟轲承袭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并对它进行加工、修饰，使之更加荒唐、更带欺骗性。他们的反动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孔老二提出“克己复礼”这个反动政治纲领来抵制地主阶级的法治要求，维护奴隶主阶级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奴隶制的礼治。按照他的这一主张，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都应当克制自己的革命要求，不去“犯上作乱”，不去“违礼僭越”。这样一来，奴隶制的礼治岂不就可以永世

存长了吗？林彪不愧为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也把“克己复礼”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妄图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孔老二把“正名”作为克己复礼的重要手段。所谓“正名”就是要求人们把违礼的现象纠正过来，严格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制度办事。有一次齐景公向孔老二问为政。孔老二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大喜，说：“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破坏了，虽有粮食，我怎能吃得到？”又一次子路问：治国当以何为先？孔老二说：必先正名。子路说，老先生太迂阔了，正名有啥要紧的？孔老二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等级名分制度破坏了，奴隶主头子说话就不好使，事情就办不成了。可见正名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头子的特权的。林贼死党叶群也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叫嚷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林付主席往那摆呀，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他们也妄图利用正名这一手段窃取国家主席的位置，然后“名正言顺”地搞他们的反革命勾当。

孔老二疯狂反对地主阶级的法治主张。晋国铸了刑鼎，他就恶狠狠地骂道：“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至于地主阶级的夺权，在孔老二看来，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一反动口号，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地主阶级在齐国夺了权。那时候孔老二71岁，卧病在床，听到了这个消息，便挣扎着爬起来，用香汤沐浴，穿上朝服去见鲁哀公，要求派兵干涉。这一丑恶表演把孔老二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孟轲继承孔老二“克己服礼”的反动纲领，鼓吹“仁政”说。什么是“仁政”呢？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他的“仁政”就是要通过“正经界”恢复井田制，通过分田制禄恢复世卿世禄制。一句话，就是要全面复辟奴隶制。孟轲一面美化奴隶制，把“先王”的“仁政”吹得神乎其神，一面攻击封建制，指责封建国家的当政者“率兽而食人”。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人们去开倒车、走老路。他把这套骗术叫做“仁术”。他向齐宣王说：“君子”是爱禽兽的，看到它的生就不忍看到它的死，听到它被杀时的喊叫，就不忍吃它的肉。那么“君子”是不是就不吃肉呢？不是，他说“君子”离厨房远远的就行了。孟轲就是这样一个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的伪君子。他说学会这套骗人术就可以“王天下”了。林贼把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国富民穷”，把他要想复辟的资本主义美化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套骗人的把戏正是从孟轲那儿学得的。

商鞅在变法中废除了井田制，而井田制却是孟轲“仁政”的命根子，所以孟轲对这一改革恨得要命，气急败坏地咒骂道：“暴君污吏，漫其经界”。为了推翻封建政权，实行先王的仁政，他煽动奴隶主起来反对封建国家的当政者，叫嚷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夺权）。”这里所说的国君正是指象秦孝公那样的国君。因为他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这自然是“视臣如草，了”芥他代表了地主阶级利益，在孟轲看来这自然是“大过”了，所以妄想推翻他。

总之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和孟轲的“仁政”说，都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是和法家革新主张根本对立的。

（二）反动的道德观和人性論

孔老二拚命鼓吹奴隶主阶级的道德——“仁”。企图从思想上下手，让人们接受礼的约束，从而维护奴隶制。他说“仁”就是“爱人”的美德。到处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一套。说得娓娓动听。但世界上果真有超过阶级的人类之爱吗？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这是对孔老二最有力的批判。有一次郑国起义的奴隶遭到奴隶主大规模地屠杀，孔老二面对着这血腥的镇压，却拍手叫好。说什么对奴隶宽大了，奴隶就不老实，不老实就应该残酷镇压。可见孔老二根本是不爱奴隶的。他公开说过：“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之间是没有什么仁爱可讲的。孔老二也不爱地主阶级革新派。他残暴地杀害了法家先驱人物少正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孔老二的徒弟冉求帮助季氏搞革新，他就肝火大发，把冉求开除学籍，要徒弟们“鸣鼓而攻之”。可见他也不是爱一切人，他的爱有个标准，不合这个标准的人，他不但不爱，而且认为可恶、可恨，要“鸣鼓而攻之”，甚至要杀之而后快。看！他的爱憎是何等分明！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仁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和违礼的现象划清界线才可爱，谁要破坏了礼，他就豁出脑袋和谁拚命。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站在反动立场上爱奴隶主之所爱，恨奴隶主之所恨。所以打击革新派，反对革命都是合乎仁的。孔老二鼓吹“杀身成仁”，就是叫人们坚持顽固到底的反革命精神。林贼的“不成功便成仁”就是从这儿来的。

孟轲发挥了孔老二关于仁的说教，宣扬性善论。他胡说仁爱之心是人的本性。他举例子说：一般的人，当他看到婴儿快要掉下井里的时候，便会产生“恻隐之心”，由此他得出结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把奴隶主阶级的反动道德说成是人的本性，而不是由外界强加给人的。这就使儒家反动的道德观更带欺骗性。毛主席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旧社会有名少童工受压榨，有多少儿童死道旁，地主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发过什么恻隐之心。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性善论是典型的先验主义的东西。因为它把人性说成是先天的。

孟轲的性善论是为其仁政说制造理论根据的。既然仁是人的本性，那么仁政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孔丘和孟轲鼓吹反动的道德观还有一个罪恶目的，就是用仁义保富贵。他们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绝口不谈利。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散布这套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这正是奴隶主阶级最大的利。这一点孟轲说得明白，他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见仁义是奴隶主阶级保富贵的法宝。法家代表

人物在各国的变法过程中都讲求耕战政策。力争以农战致富强。孟轲对此恨得要命，咬牙切齿地骂道：“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三)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

天命观是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支柱。奴隶主阶级一贯宣扬君权神授，把奴隶主总头子称作天子。以天命观论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天命观也动摇了。孔老二哀叹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他拚命宣扬天命观。孔老二宣传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它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他说：“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衰也，命也。”人力是不能改变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儒家的一个信条。孔老二妄图让人们听从天命的安排，服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老二还利用天命观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他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给自己披上天命的圣装，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孟轲和孔老二唱的是一个调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权是“天子之”的，因而是反对不得的。

孔孟的天命观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先验论。孔丘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里说得很明白，民是天生下愚的，那么谁是“生而知之”的上智呢？孔老二说：“天生德于予”，可见只有象他那样的奴隶主及其代言人才是上智，上智与下愚既是天生的因而也就不能转化了，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的奴隶们永远不许翻身。

孟轲发挥了孔老二的先验论，提出了一套闭门修养的修养经。他说人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就是亲亲之仁、敬长之义，这套奴隶主道德全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认识的道路就在于发现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何求其放心呢？那就是要思想纯正，不怀杂念，这种功夫便是“尽心”，做到了尽心，就能认识自己天生的善性，这就叫“知性”。人的善性既是老天爷赐给的，它体现了天命，所以做到“知性”也就可以知天命了。孟轲把这一套反省内求的修养方式称作“思诚”。他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就是说通过闭门修养，认识到天生的奴隶主道德，就会安于天命了，所以“乐莫大焉”。这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劳动群众是一付麻醉剂。

林彪的“天赋之才”“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爹妈给的好脑袋”等等一套天才论，以及“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修养经，全是从孔孟之道那里搬来的。

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劳动群众实践经验最丰富，因此“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敢承认这个真理。因为承认了它，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必然灭亡。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宣扬天才论。

(四) 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有两个含义，一是调合折衷，孔老二说：“礼之用和为贵”。二是反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他说：“过犹不及”，就是说事物超过了它的量的规定性，或不足这个量，就会起变化，所以他都反对。这套谬论是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斗争的学说和发展变化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

孔老二鼓吹中庸之道是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老二的“过”和“不及”是以周礼为标准的。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超过了礼的规定；子贡要取消祭祀上帝的羊，没达到礼的规定，所以他一概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都是反对周礼的，他们对周礼不是“过”就是“不及”。所以他的再传弟子子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老二还用中庸之道去调和奴隶社会的矛盾。他要求奴隶主之间要“忠恕”；奴隶主对奴隶要“宽猛相济”；奴隶应当“劳而不怨”“贫而不怨”；奴隶主还要“惠而不费，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一套都是为了调和奴隶制社会的矛盾，维护奴隶主的统治。

总之，中庸之道在哲学上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政治上它是反革命的理论。

林贼鼓吹“中庸之道合理”，用中庸之道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充分暴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丑恶嘴脸。

(五) 英雄史观和复古主义

孔孟历史观的第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孔老二说：“君子之德”好比风，“小人之德”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天生圣人主宰历史，人民群众只是跑龙套的。因此他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百姓只能听圣人摆布，用不着懂得道理。孟轲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历史全是先知先觉的伟大人物创造的，老百姓只是受他们教化的对象。统治者既然这样费心教化人民，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天下之通义”了。人民就应该对统治者感恩戴德，服从统治了。

林贼自比“天马”，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把人民群众看成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女儿的群氓，这种唯心史观正是孔孟之道的翻版。

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劳动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林贼违背历史潮流，反对人民，结果和他的祖师爷一样，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孔孟历史观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就是复古主义。孔丘、孟轲都主张复古倒退，反对社会进步，孔老二把过了时的周礼看成是宝贝，拼命维护它。他说“周礼是以夏商两朝的礼为借鉴而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是赞成周朝的”。相传那个制礼作乐的周公是他顶礼膜拜的人物。他不但白天想着周公，夜里做梦也忘不了周公。有些日子没有梦

见周公，他就哀叹道：“我快要完蛋啦！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在孔老二眼里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有一次他喝酒，发现酒杯也被工匠改进了，变了模样，他就伤心地说：

“酒杯也不象酒杯了，这是个什么酒杯呀！”孟轲和他的祖师爷一样，也是把过了时的旧事物当成宝贝。他不是把西周的井田制吹得好像比天堂还要美么？颂古必非今，孔老二孟轲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吹鼓手。孔老二把西周奴隶制时代称作“天下有道”，而把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称作“天下无道”。孟轲也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当今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他提出“法先王”的反动口号，要求人们按照古代的老章程办事。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是重复、循环而不是发展，只有增减损益而没有性质的变化。孟轲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历史就是这样一治一乱的重复、循环，五百年一个周期，过了五百年就出一个圣人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用他的话说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孔老二也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只有增减损益没有性质的变化，百世之后也是如此。

孔老二孟轲用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为奴隶主统治人民制造理论根据，用复古主义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为复辟奴隶制制造理论根据。

从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中不难看出孔孟之道就是复辟之道，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反动的思想体系，它的政治纲领是复辟奴隶制，它的理论基础是反动的道德观和人性论，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天才论、形而上学的中庸之道、英雄史观和复古主义。思想路线是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这个反动思想体系处处都是和法家革新的主张对立的。

林贼拾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百般用孔孟之道来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他用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天才论篡改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孔孟之道的中庸之道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用孔孟之道的英雄史观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反动的人性论篡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贼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

四、大一统封建国家建立的前夕，法家理论体系的完备

战国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是荀况和韩非。

荀况(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赵国人，著有《荀子》三十二篇。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韩国人，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荀况和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为地主阶级的革新运动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体系，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韩非是荀况的学生，正如荀子所说：“青出于兰，而胜于兰”。荀况的学说经韩非的补充和发展而更加完备化系统化了，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不是偶然的，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因为：(一)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为法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实践基础。

(二)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去指导他们的斗争。有一次

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感叹道：我如果能同韩非交个朋友，死也无恨了。秦始皇这种心情代表着地主阶级的要求（三）法家思想是在同儒家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孔丘到孟轲，儒家反动思想越来越带有欺骗性，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封建制的全面胜利，就必须在思想上击败儒家。为此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要有一个完备的政治纲领，而且还要有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纲领。韩非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对法家学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法治政治路线

法治是法家的政治纲领，其实质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这是和儒家宣扬的礼治、仁政之类的反动政治纲领根本对立的。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就是说坚持法治是治理国家社会的首要问题。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实行法治，荀子对秦国就十分赞扬，认为秦国是“治之至也”。荀子坚决反对儒家所鼓吹的礼治，他针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教，提出“礼下庶人，刑上大夫”。荀子对儒家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奸人之雄”，主张对他们采取暴力镇压的措施，“圣王起所以先诛之也”（非相）。荀子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提出“断长续短，损有余，补不足”的原则。这就是要求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之间来一个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因此在经济上他主张“农分田而耕”，反对儒家所拼命维护的井田制。在政治上他针对儒家所维护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制》的原则。因此他主张王公大人的子孙如果是一个无才能的，就应该贬为庶人，庶人的子孙如果是有才能的，就应该提拔为卿相士大夫。

韩非子在荀子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

他说：所谓“法”就是由官府制定而公布于百姓的成文法典。法典公布后就应严格执行。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坚决反对儒家的仁义之说，主张“废先王之教”、“不道仁义”、“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之相怜”，对奴隶主贵族实行暴力镇压，不可心慈手软。韩非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地主阶级专政。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他们“以文乱法”，危害封建政权的巩固，应当“破其群”、“散其党”、“禁其行”，这就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君主仅执法而无术就会大权旁落，打了胜仗则臣下受益，开拓了疆土则变成臣下的封地。故国君不可无术。国君应将术深藏胸中，密而不宣，冷静地考察臣下的言行，以防奸伪。

所谓“势”，就是权力。他说：如果尧舜掌握了权力，虽有十个桀纣也乱不了天下，如果桀纣掌握了权力，虽有十个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国君如果没有势就一切都调动不了。所以势是非常重要的，君主应当“独擅”之。就是说：君主应该大权独揽，实行君主专制。

法、术、势结合的法治理论反映了地主阶级在掌握政治权力以后，已经总结出统治的经验。这个理论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篡权复辟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为秦始皇建立中